

《北京規劃建設》(北京: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2013), 148期, 2013年1月, 總148期

没有什么,比美好幸福的梦想更让人憧憬;没有什么,比可见可及的希望更催人奋进。最近,“中国梦”这个对全世界华人有着强大感召力的字眼,已成为一个热词,它像强大的磁场一样占据中国人的内心,让年轻人充满期待,让奋斗者看到希望,让前行者充满力量,让一个国家的复兴梦想与每个人的梦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早在1993年,著名的哲学家、政论家、思想家梁燕城先生在海外发起“文化更新运动”及创办《文化中国》学刊时,曾开宗明义地提出要“重建中华民族的骨气与灵魂”,他说:“我有一个梦,就是中国人再无分裂,再无斗争,却有追求超越真理的勇气,有对历史过错的悔悟,并发展一种宽恕互谅、互敬互爱的文化,医治民族百多年来因斗争而来的深沉……我相信天地有情,人间有爱,不同思想可以沟通,民族文化的过错可以有悔悟更新,我相信通过中西方文化的互相欣赏和吸纳,大家都能更新文化。”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19年来,梁燕城先生只争朝夕,会通中西,为弘扬传统文化,接续中华民族文脉,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共享而覃思竭虑,矢志不渝;为使苦难的同胞们生活更幸福,自由更有保障,生命更有尊严而不断呼号、奔波、奉献。

### 哲学思辨 生命领悟

首都北京,有人戏谑为“首堵”。上班早高峰,车流如织,龟行蜗步,当梁燕城先生辗转穿越大半个城区抵达采访地点时,笔者发现居然与约定的时间分毫不差。其守时的严谨态度,无疑是典型的西方风格。然仔细一打量,眼前的他,黑色边框眼镜、黑色中山装,搭配汉字图案特色领带,既不失西方时尚色彩,又有浓浓的中国元素。这似乎正暗合其中西合璧的成长之路。

1951年,梁燕城生于香港。母亲是广东番禺人,活泼美丽,多才多艺,就读于中山大学;父亲是广东顺德人,高大英俊,才华横溢,求学于岭南大学。抗战爆发后,母亲远涉万水千山到内陆坪石上课,与父亲结识。烽火万里情,在那简朴的山野之地,两人建立了极美的感情,“父亲每天写一首诗歌送给母亲”。大学毕业后,喜结伉俪的小夫妻生活温馨和美,事业风生水起。然内战将一家人美好的憧憬彻底改写。逃亡香港后,父亲所有的才华和理想,埋葬在那美丽而挤满难民的小岛,一生屈屈不得志,变成自暴自弃的隐者。当国内“大跃进”失败时,更是患上精神疾病,经常带泪茫然远望北方,口中喃喃自语:“我真正向往的是中原文化”。母亲只身承担家庭的悲剧,工作勤奋,养育两儿成长,凭着在中大所学的英国文学及优良的英语教育,在英国殖民地亦能工作立足,负责整个香

港九龙地区的社会工作。年幼的梁燕城经常跟着母亲去看望贫困的人，并留下深刻印象。“你很难想象我妈妈讲英语比我还好啊！”母亲常说十分感谢当时在国内能享受完全免费的教育，可惜时代风雨，报国无门。每每谈及母亲，梁先生又是喜悦，又是心酸。

天资聪颖的梁燕城从小就对世界的存在、人的生命非常好奇，也开启了他一生对真理、对生命本像的追求。四岁时，他就会问：世界为什么有这一切存在？六岁时，他和哥哥在阳台放风筝，看见日落余晖，非常壮丽，竟感动不已。整个童年时期，他白天爱看浮云飘忽变幻，晚上则躺在床上看窗外的星星，心中感到无比宽大舒畅。正因喜欢幻想驰骋，想象力丰富，其作文与美术成绩一直很棒。

自家庭变故后，一向生活无忧的梁燕城一夜长大，学习异常勤奋刻苦，并开始探寻人生的出路，希望找到解决苦难的途径。自十三岁始，他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家、佛家、道家思想，对孔孟、易经、气功、灵界……都有了解和研究。十三岁，正是偎依在父母怀中撒娇、在操场上与同学尽情嬉闹的年龄，梁燕城却已开始阅读《庄子》，也看歌德的《浮士德》与但丁的《神曲》；十四岁研究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十五岁研究佛经跟打坐；十六七岁开始读道家；十八九岁读儒家。

上世纪 70 年代，梁燕城考入香港中文大学，“那时候考中大是很难的，我们学校 150 个同学只有 2 个考上”。入中大新亚哲学系后，梁燕城师从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研读儒道佛的哲学，从理性上了解儒道佛的修为和思想。大学期间，他被颁赠成绩优异奖学金，遂决定用这笔钱到缅甸、印度和尼泊尔流浪，进一步体会佛教和印度教精神。1982 年，梁燕城入美国夏威夷大学，跟随世界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成中英先生学习《易经》与中国儒学，跟随著名的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孙国栋先生、余英时先生等研究中国历史，取得哲学博士资格。

研读哲学多年，梁燕城先生有四大领悟共绘。

第一个是从佛学中领悟出来的，即人生是变化无常的，一切事物在因缘起灭中，均不具有不变的实体，这称为空。“有了这个领悟，你就可以放得开，放得下，事情成败、得失都没什么。”第二个是从道学中领悟出来的，即变中有不变，这是易经的卦爻。道家有一个名词叫“道”，即事物发展的道路，可视为发展的规律，如一颗种子掉在泥土里，长大后，它如果是桃树种子则还会变成桃树，不会变成梨树。又如相伴多年的太太，在梁先生心目中永远都是一朵美丽的百合花，这爱与欣赏之道，是变中的不变。第三个是从儒学中领悟到的，即人有恻隐之心，见到他人甚至生物受苦，人有不忍之心，是人的仁爱本性。儒家思想让他知道人是有价值、有良知和尊严的。但良知从哪里来？“天命之谓性”，儒家认为良知从天而来，天是仁爱本性的根源。这就促成了他的第四个领悟，宇宙的本体是仁爱的，这仁爱的本体应具有性情，即古人所谓的皇天上帝，从基督教了解上帝在人间通过十字架的牺牲，而承担众生的苦罪，遂决定一生跟随宇宙的仁爱真理而活，愿意牺牲自己去爱人类、爱国家、甚至爱天地万物。

作为一个信仰的寻求者，梁燕城先生经历了从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气功的流浪，最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但他并不因此排斥以前追求的各教，反而更加爱护中国文化和哲理，每当想起孔孟、老庄、程朱陆王、释迦龙树、六祖法藏、智者大师等，都会肃然起敬，绝不因自己的信仰而有傲慢之心。至于恩师唐君毅先生，更塑造了他的人格学问，故每年新年均去叩头请安，其逝世后，亦常怀心中，甚至梦中相见。

### 仁者风范 赤子深情

仁，是爱人，也是一切合宜的美德善行的总和。虽只短短的几次接触，但梁燕城先生爱国爱教的崇高情怀，谦和淡泊的儒雅气度，博施济众的仁者风范，正直刚毅的铮铮铁骨，勇猛精进的无畏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洋装虽然穿在身，可心依然是中国心！因为祖先早已把你的一切烙上中国印！”自幼熟读中国历史文化的梁燕城先生，虽然过去没有机会回国，无法投身祖国的建设与发展，但一直通过书本了解中国山川大地和人民，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年轻时，梁先生流浪到尼泊尔，他曾经在黑夜里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为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中国祈祷。那时他泪流满面，说自己到了阿里山就像到了泰山，到了浊水溪就像到了黄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香港大专院校任教的他，当看到美国著名谐星霍普访华与中国孩子共舞的一幕时，就许下的心愿，希望终有一天能教育真正生长在中国的孩子。八十年代末，梁先生来到黄河岸边，特意抓了一把黄土包进怀里，当地的老乡惊问其故，他回答：“这是我祖国的泥土！”1995年，梁先生受中山大学邀请首次回国演讲，心潮澎湃的他效仿犹太人的修殿节，点了九支蜡烛，纪念此事。“犹太人重建圣殿，是民族文化的大事，我也在此一生第一次回国讲学，在中国百年的大难与凌辱之后，参与重建，那时就展开了文化更新的多年奋斗。”梁先生动情地说：“若不是中国历史与大地的呼唤，恐怕我不外仍在西方当个教授，有空时批评指点一下中国，而把自己的最高理想埋葬在北美那新奇年青的大地中。”

著名的社会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Jeffy Alexander 曾提出“culture trauma——文化创伤”一说，就是一个民族、或者一群人，经过长期不断的苦难，这个苦难已经变成他的文化诠释里面的故事。梁燕城先生认为这个词较贴切地描绘了近现代中国的国情。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尽外国欺凌、自强失败、长年内战与斗争之创伤，延续不断的苦难，使整个民族有说不完的伤痛，这创伤已成为近代文化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有时反应过激，有时过于保守，以致改革开放道路艰苦而曲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改革步入新阶段，但彼时西方列强仍在制裁中国，前景十分迷惘，举步维艰。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精神世界空虚迷茫痛楚，焦虑而没有安全感，造成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灵魂危机、社会危机……已移居加拿大的梁燕城先生，身处西方文化居统治地位的海外，更有切肤之感，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放弃了属世的荣耀和权益，凭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态度，动心忍性，履艰忘危，

在各种困难与障碍的夹缝中，以传教士般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维护和弘扬中国文化。最初，他找来三十位志同道合的海外华人一起分享：以往海外华人，要么骂中国，要么亲中国，但没有人是用爱来回报中国的。他希望能走出第三条路，即用爱与参与、牺牲来回报中国，“以爱来奉献中国，不拿中国一分利益”。结果三十个人，一人捐了一百元(约七百元人民币)，合起来共三千元加币，后来，他们以这三千块钱开始筹款，得到华人的积极响应，共筹到六万块加币。1994年，梁燕城和他的朋友们在加拿大成立了“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创办了海外华人鲜有的大型中文学术季刊《文化中国》，以探索更新中国文化之路，并提出“重建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他说，150年来中华民族是一个受伤的民族，“中国是我的母亲，她是我历史文化上的母亲，你不能一天到晚都骂母亲啊！不能鞭打母亲，反而你应该去医治她过去的伤痕。”所以他主张“以无尽的爱、无条件的爱来包容”中国，以仁爱和服事医治中国人的心灵痛苦，继而呼吁海内外人士关注弱势群体，减少贪污腐败，加强医疗和教育的保障，鼓励青年发展，建立公平仁爱的保障体制。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是一个非牟利、非政治的文化学术机构。为了重建文化中国，梁燕城先生和他的朋友们“19年与祖国同行”。他们都不是有钱有权的人，以仁爱之心奔走呼号，集聚无数中产华侨的资金，以“文化更新运动”捐回祖国约六千万元人民币，用这些钱资助十多个大学的学术会议，多年来持续参与四川震区灾民的心灵辅导工作，资助了6000名人次的贫困学生受教育……而他们自己，“为了贡献祖国”，却宁愿放弃高薪，志愿拿较低的薪酬。包括梁先生在内，1998年在香港建立办公室，成为回国基地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放弃高薪(其中一位十多年献身的总裁程女士，放弃了七十多万年薪的工作)，大家没有私人汽车，上下班挤坐公车和地铁，他们不用捐款购买办公室，而选择一种相对清贫的生活。他们身体力行，在异国他乡为“文化中国”建设做出了牺牲和奉献。其实，机构成立之初，就有一家香港商业电台的总经理飞赴加拿大，以120万港币起薪点的年薪邀请梁燕城先生回香港当评论员。无疑，这对当时“文更”前途未卜，在机构拿着较低薪水的梁先生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十多年前120万等如现今300万了，再拿来投资将可发达。但仅稍作思索，他就毅然放弃了这份高薪聘请。“反正我在加拿大生活已经不错了，从前两夫妇工作薪酬较高时，经母亲资助，已买有一幢带花园、面积达三百多平方米的住宅，也有两辆汽车(这在加拿大是普通中产的生活)。拿了百万高薪后，无非是把房子再弄大一点，地板与家具用名贵产品，开更高级的车子，这对我没什么意义。当时我已42岁，我需要的是把我生命的后几十年，把自己最好的时间献给有需要的人，把爱献给一个曾经受苦很深的民族。13亿人的灵魂重建比120万更重要。”正因有了梁先生的坚守，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事业日益蓬勃，现在已发展到世界各地，并于1996年在美国成立美国办公室，于1998年在香港设立中国香港办公室。

让爱作证 枯木逢春

19年来，梁燕城先生在中国走遍大江南北，从烟波浩渺的沿海城市，到西北辽阔的戈壁草原，再到西南葱翠的崇山峻岭，他与最草根的农民、城市民工、寒门子弟交朋友，与最高学养的知识分子论学，也和各级官员交往。这也构成了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在三个不同领域的工作内容，即领袖文化的培训、学术文化的会通，以及关爱文化的实践。

“我在中国与官方有更深一步的对话，主要是关于反腐败的问题。”1997年，梁先生与上海复旦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开始在中国提倡廉政文化，先在海外筹款30万元，成为惟一申请到加拿大国际援助基金的华人机构。后又得到上海政协支持，共同推动廉政研究交流。1999年，在上海及温哥华两地成功举办中加廉政交流会议。有一次半夜起来，看到上海茫茫的夜空，想起一路走来的艰辛，想起当时中国仍是落后贫穷，发展困难重重，梁先生哭得像个孩子。考虑中国腐败问题的治本方法是重建道德，从1999年至2001年，梁先生开始在中国提倡符合新时代的道德教育，建立道德教育的教授团队，到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办道德教育讲座与培训。也由此，他与官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并开启了文更工作的一个新层次，1999年，梁先生被领事馆推荐到中国国务院对话，其后与中央政府高层对话，包括统战部、国务院、文化部及宗教局等，共同探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方向。因为当时海外媒体一般是否定中国，而经常活跃在各大媒体的梁先生则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平衡了很多对中国无理的批评。十三年来，对话一直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梁先生提出了包括贫困孩子、医疗、文化发展、人权改善等内容的30多份建议书，如医疗问题，他提出能否没钱也可看病，建议对富人收费多点，对穷人收费少点。又如教育问题，当时只有九年义务教育，未有免费，梁先生在胡锦涛到温哥华时，写了一个九年免费教育的建议书，由领事转交“现在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我很高兴。这也说明政府是负责的。”“我们完全中立，只讲真话，实际上政府也想听真话。”他感叹说：“中国的改变实在是太大了，官员的素质越来越高，官员对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的这种努力，人民向上的风气，中国制度改革的方向都是很让人惊喜的。”

长期以来，西藏、新疆一直是西方媒体涉及中国报道的主要议程和舆论研究的焦点，更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西方在把藏独运动道德化的同时尽力妖魔化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同时，把新疆问题视为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压力。为推动世界对西藏、新疆等历史及社会发展真相的了解、推动外界对这些边陲地方的文化加以尊重，梁燕城先生多次向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提交两地历史与实况的英语论文，帮助其认识中国观点。2008年，西藏“3.12”暴乱后，加拿大亲藏独议员向国会提交批判中国人权议案，梁燕城先生被国会外交小组邀请为中国人权状况作证，他用英语写了八页中国人权报告书交给加国部长与议员，表示以加国公民入中国参与建设十多年，本身并非来自中国大陆，在中国未做生意、未赚过任何钱，以中立身份观察中国多年，见到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有相当大空间，虽未至完善，但在不断改进中，自己多次参加宗教对话会议，在不同大

学教过宗教，参加过三自教会崇拜，均有自由。也亲自到西藏观察过，与藏人讨论过，从未见闻到平日有何压迫宗教与藏人现象。“相反，我在西藏看到的都是信众们在街上叩头敬拜，没有受到干扰。”他还认为很多西方人思维固步自封，不了解中国：“我曾经推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兰州对话。对此，国会议员觉得很惊讶，他们认为宗教会遭遇中国政府的镇压，怎可能容许宗教对话，而我则邀请他们来中国观察这类会议”他在国会听证会中结论要求加国政府应先了解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像一位老人，须要尊重，而改革才三十年，像一位少年，须加以鼓励，先尊重和鼓励，而后可展开合理性的人权对话。结果国会搁置反华议案。国会外交小组事后发函致谢梁先生提供的数据和经验。

近年来，梁先生多次参与中国重大历史活动。2009年，梁先生获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六十年国庆大典；2010年，梁先生等三位文更代表被邀出席“上海世博会”闭幕式；2011年，获中国政协邀请，出席10月国庆典礼；2012年获中国政协常委推荐，提名成为海外列席委员。在今年“两会”上，梁燕城先生建议：“建立一个中华文化的共同体，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应该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都应该都是大彩虹里的每一种颜色。我信基督教，但是我发现我和穆斯林的共同观点也很多。所以，各种文化应该共融，互相包容。”而出乎意料的，是加拿大政府也表扬梁先生在中国的贡献，除了国会曾颁发奖状外，2012年底颁发英女皇登基六十年钻禧荣誉勋章，认为梁先生在他国的献身，是加拿大的光荣，也对中加更深交流关系有贡献。

本是谦谦学者的梁先生一向重视与内地高校的交流。历年来，他多次在国内大学进行学术研究、交流、讲学，以及担任博士指导教授，包括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及山东大学等。如2009年与四川大学合作，召开了第一届“灾难与宗教——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学术会议；与兰州大学合作，召开了第二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与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都市发展与文化保存”国际研讨会。通过交流，他发现国内学术界很活跃，学术自由度也比以前大了很多。

梁先生不仅关注与精英阶层的对话，更是倾注了绝大部分的精力与心血来关注草根阶层的弱势群体的幸福。

自2001年开始，梁先生上山下乡，到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关怀农民，到城市的高楼森林爱护民工，聆听穷人的悲呼，拥抱失学的孩子，通过海外筹款，展开贫困儿童与青年助学，至2012年，已资助了六千名贫困家庭学生入学，并在广西、云南两地建设学校14所。梁先生曾经从加拿大用了十二个小时飞到香港，几天后由香港花三个半小时飞到昆明，从昆明飞文山半小时，下机时已是黄昏，再坐车两小时到富宁，第二天又花两小时入山，到达云南中央镇木杠小学，与学校的孩子们见面。行程二十小时，前后用了三天，做这一切是为了甚么？梁先生说：“那是因为我爱他们。”寥寥几字，胜过千言万语。他觉得，虽然孩子们的生活很贫穷，但是他们的人生艰难而向上、贫穷而奋进。“我们能为他们助学，使他们一生有前途，同时走入大山向农民学习，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荣幸。”

有一次，在云南丘北县与文山州的高中，梁先生与其资助的同学会面。一名叫张醒的贫困高中生，送给文化更新中心一块枯木，他把其顶的两条树枝涂上绿色，在主干上刻了一句话：“爱育枯木发芽”。原来张醒以前很内向，不大与人交往，加之家境极其贫穷，故十分自卑，因此他一向自视为一块枯木，但当文更的资助来临，不单给他所急需的经费，而且深深地关爱他，尊重他，使他这块枯木得到滋润，得到生命，枯木已经发芽了。

梁先生认为，过去伤痕累累的中国亦似枯木，但当无数人以无条件的爱和牺牲，用血汗去浇灌时，祖国终于发芽，且长大成春日的树木，生机勃勃。2009年，梁燕城先生应邀参加60周年国庆大典，当他看到游行队伍中由五千个孩子组成的方阵，走在天安门广场前放气球，歌唱祖国时，心情激动不已，因为此刻的他想起了自己曾帮助过的那六千个孩子。“我们只帮助了六千个人，在全国实在是很少，但起码我真的帮助过六千人，对祖国这段历史尽了责任。”过去在海外只是一位知识份子，一个写书教学的教授，救国无门，真是‘无材可去补青天’，但自从投身服侍中国人民后，人生并非‘枉入红尘若许年’，却非常扎实和喜乐。而且学术并未因实践退步，反而每年仍写四篇论文，出版了十二本书(三本学术巨著仍在印制中)。

由于梁先生身体力行的影响，其家人也全部参与到服务中国的事业中来。太太是加拿大世界宣明会的得力干将，曾在中国多年水灾和地震时募捐了超过100万加币救灾，也曾帮助云南山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重建家园，后来，2005年她也放弃宣明会颇高薪的工作，以她这些经验，义务投身文化更新工作，回国上山下乡，减轻梁先生的工作压力。她在大学时认识梁先生，曾说自己名字是曹娟华，「华」字就代表中国，不过梁先生却说，「华」字也代表鲜花，她是娟秀的中华花朵。女儿梁尔欣小时候常常看到父亲拖着行李箱上飞机来中国，她不太明白，后来进入基督教大学就读，其间到中国农村做志工教英语，回来后明白了中国穷人的需要，也明白父亲为何放弃一切回国了、毕业后，她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到中国山区免费教英语。“这不仅帮助了别人的孩子，也同样帮助了我自己的孩子。”梁先生感慨地说。在梁先生50岁生日时，女儿写了一张卡片送给他，上面写着：“给亲爱的爸爸，多谢你多年来的教导和你作的榜样，令我对中国也有同样的爱心和 passion(激情)，我知道你的事工(文化更新)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我想祝福作在中国的事工工。我想我可以做的，就是自己也去中国多次和鼓励更加多的年轻人也去中国。这是我的理想。”女儿取得硕士学位后，已投身文化更新工作，每年都两次带志工服务贫困地区。同样，受其熏陶，梁先生的小儿子梁尔道也加入为中国奉献的行列，多次回国教英语最近，他刚结束在山东烟台的一年英语支教活动。

“我在中国常用《圣经》上的两句座右铭自勉，一句是‘爱是恒久地忍耐’，还有一句是‘爱是永不止息’。”梁先生解释说，“爱是恒久地忍耐”就是回国后，发现中国还有很多不足和欠缺，但是并不因此否定她诅咒她，而是永远忍耐她鼓励她。爱是永不止息，则是说即使真的改不好，还是永远爱她宽恕她。“令我惊

喜的是，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进步很快。”梁先生开心地说。19年来，他见到最贫穷的县城，因着公路开通，而日渐繁荣；他见到资助的城市民工子女，父母在经济发展中改善了生活；他见到资助的穷学生大学毕业，变得健康活泼，且愿以爱心服务其他穷人；他见到残破落后的旧城，发展为现代都会；他见到贫寒城镇开始开发新区，并建设了四星酒店；他见到新一代的行政领导英语水平提高，年青人则奋发向上；他见到大学教授的朋友，由六百元月薪到搬入一百多平方米的新居；他见到报刊、媒体及普通百姓从小心讲话到放胆直言；他见到大学可以自由发表学术观点；他见到不同宗教间可自由而和谐地对话……

## 人文城市 精神乐园

当中国跃居全球 GDP 第二位时，我们曾有过短暂兴奋，随即陷入沉思：经济的繁荣，带来俗世的迷惘；城市的繁华，正摧毁着最可珍贵的文化遗产。

对在香港长大的梁燕城先生来说，古都北京宛如梦幻中的世界。时隔经年，他仍清晰地记得，1982年第一次回国，当走入响往已久的京城时，最难忘怀机场旧路两旁的白杨树、宏伟而又残破的长城和故宫，以及满街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北京很老，但很美，恢宏壮丽，如梦如诗。及至今天，北京已是高楼林立，汽车如织，废气弥漫，成功发展的代价，是“失去了纯朴和优美，使人和文化失去了灵魂”。梁先生说，后现代的西方城市建筑中，人们用铁窗、铁闸把自己锁在屋内，豪宅更建成堡垒一样，城市因富足带来精神荒凉，结果形成“枷锁城市”。他呼吁，中国不要陷入西方城市的相同困境中，五千年的文化古国应有一个“人文城市”的理想。

建设人文城市，首先需要规划好人文空间。梁先生认为，除了科学上的物理空间外，也存在着一种社会与文化上的建构，即“人文空间”。城市中的人文空间是一个交错互动的世界，城市设计中，如能建立一个和谐美善的人文空间，可以使不同阶层的人幸福快乐。

梁先生强调，作为关系性的身体，在城市空间中运动，其所处的位置和社会关系，决定了其地位与尊严。如在北京上下班高峰时段，跻身于地铁或公交车中，人身体几乎不能移动，而且男女身体挤贴在一起，两性之间没有分别，身体没有了私密性，人也失去个人独立的尊严。坐在出租车之中，或由司机驾驶的空调私家车中，身体的空间位置就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地位。住在民工的狭小单位中，其身体空间与住在豪华别墅中，当然完全不同。人成长的空间，其社会地位构成的物理环境，极大影响了人对自己的认同及其心理的状态，如阶级、种族、学识等，均使人在身体上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梁先生建议，在做城市规划时，必须依据空间正义的原则，来开展用地的方案，使弱势者得到与富足者接近的尊严。最低限度不以低价抢夺贫困人的土地，以满足地产市场的需要。如北京向外发展到五环六环时，规划须考虑建立民工住宅区，使民工有符合环保要求的、儿童可以活动和受平等教育的空间。其间有民工的投诉机制，当其受剥削压迫时，可在区内信访，其尊严与权利得到党与国家的保障。只有这样，城市才能真正成为人们的精



神乐园。

为避免城市变成精神文化的荒原，梁燕城先生提出，在编制城市规划时，须特别成立一个小组，先请学者详细研究城市的灵魂，特别是精神文化的特质。从其历史事件、文化学术、生活特色、古老建筑、艺术表达、传统小巷与商店等，了解人民的精神表现，掌握整体的文化表现，进而保留历史建筑、艺术风格、生活特色，保障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等。

梁先生饱含深情地说：“我梦想一个人文的北京，一个有灵魂、有文化、有正义的北京。”他希望，以天坛为中心，代表自古中国对宇宙终极真理的尊敬，以地坛代表保育大地的绿色理想，以天安门与故宫代表数千历史，以圆明园代表近代的挣扎，以党校中的耶稣会士墓代表中西文明的交汇，以北大清华代表现代文化的吸收，以“鸟巢”与奥运村代表后现代的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代表后后现代的多元和谐，建立城市中的公众互动对话空间，使古今中外交融，成为中西文明融汇的未来指向。也希望作为全国首府的北京，能成为世界文化对话的全球公众空间。

人生因梦想而美丽。19年来，梁燕城先生怀揣梦想，带着对中国大地与人民的亲情，带着真善美爱天地之主的恩情，坚定执着，与祖国同行，为国家分忧，我们相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激动时刻，有了众多像梁燕城先生这样的炎黄子孙为“中国梦”添砖加瓦，梦想一定会照进现实，中国的明天会更美好。